



话语的德性

谢有顺 著

批评也是一种写作，一种能“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的写作



话语的德性

谢有顺 著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话语的德性 / 谢有顺 著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2.5

ISBN 7-5443-0392-6

I. 话... II. 谢... III. 文学评论 - 中国 - 当代 - 文集

IV. C3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3232 号

话语的德性

作 者: 谢有顺

责任编辑: 黄明雨

封面设计: 第三工作室

版式设计: 孙志敏

责任校对: 汤万星

责任印制: 李 兵

印刷装订: 北京宏伟印刷厂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5000 册

书号: ISBN 7-5443-0392-6/I · 10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邮寄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杨秀美女士 收 / 邮编: 570216

话语的德性

谢有顺 著

批评是一种能“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的写作

游手好闲地思想

黄 钟 著

我们每个人既是宽容的对象，也是宽容者

一个平民的政治主张

程亚文 著

人类及其文化的存在，在想像之境，浮现出它的价值与意义

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

卢周来 著

任何形式的歧视都是恶，任何与之背道而驰的努力都是善



海南出版社

序

贾平凹

当谢有顺在《小说评论》的专栏文章一篇篇发出来的时候，我到处打问着：这是谁？他终于从咸阳机场的大门里出来了，一个年轻得连胡须还没有长黑的后生，站在了面前，那一瞬间里我是哦了一声，如突然地被谁撞了腰。我不是不服一人的人，也不是见人便服者，但从那以后，我是那样地喜欢和尊敬了这个南方的小伙。

差不多是九八年吧，我开始搜寻和张扬谢有顺的文章。这种行为曾经有过，即文革后期第一回读了沈从文的一篇小说，便每到书店都翻那些综合选本，三次为了他其中的一个短文而将整本书买下，那时的钱对于我是一分要掰成两瓣用的啊。

中国人历来有文者相轻的习气，在我认识的文友中，常常有这种现象：只对外国人说好，只对古人说好。而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在很长的时间里有着不正常，要么谁都可以得罪，评论家不可得罪，似乎作品就是为评论家而写的，要么断然拒绝评论，宣布我从来不读那些评论文章。谄固可耻，傲亦非分，这何必呢？我是一个太普通的作家，作品又常引起争论，二十多年里见识了各种各样的评论家。当我初学写作的时候，我的确爱听表扬，反感批评，年事较长，终于体会了前人的一句话：“遇人轻我，必是我无可重处，置珠于粪土，此妄人举，不足较，若本是瓦砾，谁肯珍藏？”心平气和下来，倾听各种声音，自然能获得

立竿见影的或潜移默化的好处。由此，我感谢着那些为汉语文学的进步而努力工作的评论家，虽然与他们本人始终萧然自远，却在书房里仔细阅读着他们的文章。

我之所以为谢有顺的出现而激动，是他的那一种大方的品格，他或许还没有飞到一种高度，但他是鹰，一定会飞得很高。前卫而不浮华，尖锐又不偏狭。如果说北方的评论家沉厚，注重于写什么，南方的评论家新颖，注重于怎么写，谢有顺却汇合了他们的长处，酝酿和发展着自己的气象。我和许多作家不止一次地交谈过，他是有着对创作的一种感觉，所以他的文章对创作者有一种实在的启发。

这个夏天，我有幸地读到了谢有顺的这本新书，如此集中再读，该痛快时真痛快，该思索时就慢嚼，一边有“目当暗处能生明”之喜，一边却也生出“既生瑜尔何生亮”之怨。我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评论家，我早已中年，他尚还青年，即使指天上的一朵白云，我也用不着慷慨赠他的，但我哪里又能对涌来的明月不说声感谢呢？因为我们都是文人，同样面对的是“永恒的和没有永恒”的中国当代文学。

2001年6月26日夜

我们的青春和学术的意义

——“197 几”文丛总序

余世存

一批新学人的文丛，在热心的朋友们的参与下，即将问世。在筹办的过程中，我听到了不少的故事，首先，这些新人们，都是 70 年代出生的，他们跟正当红的美女作家们同龄。找寻这些如今以新人类活跃在社会上的一代人的思想者，可不如寻找美女作家那样容易。听说，吴冠军先生是 1976 年出生的，我知道的林国荣先生更是 1978 年出生的。他们的知识功底自不待说，而且他们也自觉地思考生命和社会之重。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我因此愿意接受卢周来先生和出版社的邀请，读其样稿，并为之说几句话。

说到对新学人的期待或关注，我大概不算太晚。1996 年前后，经朋友提醒，我开始注意到 90 年代高校学生的情况。我自己是 60 年代出生，80 年代在高校受教育的这一代人。我们闷头闷脑地被赶到社会上后，无论是知识准备还是心理准备相当不够。我仅仅知道我们对艺术、真理、知识等等曾登堂窥奥，我们见识过某种新异的人生境界，我们的使命乃是让我们的同胞了解并拥有生的灿烂。至于才学识等等倒在其次，反正那时的我心里特别地虚，在大学入宝山空归的感觉庶几类似，当然到现在也仍觉得自己无特异，无大能。我们空有理想、青春、热血，缺乏足够的学识和经验，这种理想情操使我们对人生有自己的标准，不仅知

道同龄人的背叛，也明了他人的距离。例如对上一代人，四五一代，上山下乡的一代，我们是悲悯的，觉得他们的青春虚掷得可以；而对后生小子大抵是轻视的，觉得他们接近物欲，他们大部分都俗得可以。因此，尽管我们知道自己的悲剧，我们仍觉得自己足够坚实足够自豪，我在《哀朱海军》一文里，就这么说过，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凉心眼要么看兄长一代们帮忙帮闲，要么看新人类们莺莺燕燕。

为什么要用“代”来立论？因为代际存在是我们社会的主导形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大学里明明都学会了现代社会那种科学的分析说明，届，级，等等。我们在届级一类的划分里相辅相成，共生共荣。但为什么到了社会上（自然也包括大学体制）却摇身变成了代的存在。代际的更替总是以革命性否定性为本质来完成的。假如我们想到第三代第四代一类的字眼，想到新生代，新人类，新新人类一类的字眼，上一代人必须退出历史舞台，才有后代人的活动空间；新人们必须用各种方法例如身体写作一类，才有可能颠覆上一代人的活动方式，……我们也许能承认我们社会这种最为实在现象的悲剧或滑稽性质。

这是我们社会的特性之一。那就是，直到今天，我们的知识流布极为艰难、狭窄。同样的知识内容很难均匀地分布到知识人那里，更难指望下一代人有同样的接受和运用效果。而知识之外的际遇，参与了知识人的身份构成。因此，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几乎没有什么积累或连续性，其抱残守缺为人诟病又无可奈何。每一代人都参与了革命性的破坏，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极端表面的形式。如果说传统中国的知识至多是跟着王朝解体而出现革命的现象，（因为道统的延续，其革命多表现为道统内部的学派创新），那么，近来以来的中国知识则在代与代之间发生了造反式革命。即以上个世纪为例，30年代北平的沙龙如何看得上五四的激昂，40年代救亡的声音又如何容得下知识演进的从容，50年代

则更要在一穷二白上描画蓝图，60年代要彻底否定以前，70年代自以为拨乱反正，80年代引进西方知识以进行思想启蒙，90年代以学术热轻嘲启蒙的空疏。假如我们诚实地理解这些现象，我们得承认这种革命现象，不是知识本身生发的革命，而是每一代人借助于知识之外的力量，进行造反，进行代际的疏离和相互敌视；不是知识的延续更新，而是知识霸权的更替，言必称希腊者，言必称马列者，言必称传统者，言必称后现代者，言必称全球化者。合法性正当性被抛离一边，共和共生的多样丰富被弃置，当一代知识人的主流地位或体制权威确立后，就只剩下对其他人的敌视封锁屏蔽，剩下命令利用粗暴教训，剩下体制权力带来的腐败僵化保守。而知识的传承更新竟需要一代人的退场才有可能，一代人如果不是因为自然原因（高龄、死亡），就不会出现新一代知识人的机会和得意。而我们看到，除旧布新，用时髦的话说，不过是双方或各方争夺知识的霸权，是争夺权力的位置。

这恰恰说明，我们近代以来的知识体制里的身份职位都是缺乏现代性说明的伪身份职位，我们的知识霸权是缺乏文明道统支撑的伪权力。我们的知识在世界知识和现代理性的参照下，尚未能完成传统知识结构向现代知识体制的更新，如前说，知识体制必须容纳各方的知识创造，自由独立是其标准也是目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知识体制仍需要其所归属的知识人来说明，从而，这个我曾称为前现代社会的伪身份伪权力大大诱惑了知识人，以为自己一旦占据体制的身份就能攻破体制的堡垒，就能发布深刻伟大的学术思想；新一代知识人要想占据体制就得推翻和革命掉旧的知识人。貌似维新，却在所谓“学术思想”的名义下迫害限制了其他人的学术思想，客观上不过是占据了体制的好位置，并不能使体制革新。这种悖论使我们的知识界充满了代与代之间的革命，维新进步一说无从谈起。四五一代人在90年代最具

有创造性表演的时间就面临着这种紧张难堪，他们以为体制内的位置和知识里的创造是可以兼得的，尽管有人质疑过他们是否是独立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仍以为能够代言知识、良知和正义。就这样，这个知识的体制是需要改造甚至废掉的，可是我们缺少另外的身份感来抗击它（民间办学和民间学人还未能形成自己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知识界没有自觉合力对抗这一伪身份体制的诱惑，没有权力自觉及正当实践，从而有效地消解知识体制的僵化腐败，使我们的知识体制有着开放的自由、机会活力和权威尊严。

这种体制如何改造或废掉？我不知道确切的答案。我和一些朋友划分过百年来几代中国学人，与其说我强调的是革命，不如说我呼吁的是和解。我想说的是，所有那些自以为空前绝后具有超越特性的知识人，都将归队于他所属的一代人的精神使命。四五一代人，我这一代人，等等，也许历史在悲喜剧里赋予了他们不同的精神要素，但这些历史精神本身是并行而不相害的。假如一代人逆所谓天命或历史潮流，以知识、真理或良知正义一类的名义行事，命运会安排另一代人来为他们送行。那里同样有知识，有真理，有良知正义，更有青春。

如今，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上场了，尽管知识之外还缺乏大的历史事件使他们现身，或者，他们将永远消失在所谓的市场社会里，消失在世俗的微小叙事里。那是否是我们社会的幸事？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知识体制，我们知识的传承、荣耀和权利分配等问题永远锁定了。但是，就连知识体制外，大量流亡江湖的我这一代、四五一代都在以各种方式消解嘲弄着体制的岸然道貌，而且，据我所知，北京的一些年轻朋友也在近两年对知识体制进行了有力的抗争。这说明，知识体制的存废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年轻的朋友们从对西方经典的解读入手，一步步抵达知识、生活的真理殿堂。正是有西方经典等世界知识作为理由，他

们对当代汉语知识的简陋了然于心。（是否也对现行中国知识体制的局限或专横了然于心？）我那时关注他们，听说他们将要有所贡献于学术，坐冷板凳，自觉与浮躁的现实社会保持距离，为此不惜对现实保持沉默以与现实体制绝决。我的敬重之心难以言表。悲剧性的在于，他们的知识活动，他们超越于“城邦”现实之上的哲学家般的生活，也不会是一块净土，他们仍得立足于他们与之保持距离的城邦现实本身。这种现实体制限制了他们的革命性本质。他们也将走一代代人的老路，理想颓唐，沮丧无力，人生造化，原来如此。

是的，即使与他们的大学青春期比，时代也发生了质的变化。90年代初“淘金”的希望何止于纯粹经济领域，不仅项飏先生有那样好的际遇和勇气；而且，民办学校也风起云涌，小学中学大学，知识的传承对官学的惟一性和绝对性构成了竞争；大量的青年学人流入社会，他们自有与体制距离的眼光和创造抱负。……但是，今天，所有这些良性的因素已经消失，浙江村在市民的眼里消失，民众对生活不再充满暴富的希望，只有苟活的不安恐惧和仇恨；民办学校是官学的复制物，工具性更为明显，他们无力也无意识创建自己的学术机制；而青年学人们也只有跻身于学院科研院所才有出头的可能；四五一代人的知识关怀日益减弱，尽管新左或自由主义的思路言路使知识界一度显出分裂之势，但他们人生中年虚无的心态已在体制里都乐得颐养天年；我这一代人也适应并消失在中国社会体制里，知识共同体的重建失去了力量。学术腐败因此能在越来越封闭和支离破碎的学术界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少数流落民间的独立或自由撰稿人要么孤军奋战，要么寄身于戏子娱乐的行业。我们的时代充满了热闹，但我们的希望落空，我们收获的是跳蚤，当初种下的可都是龙种。

幸又不幸的是，青春仍在，青春也是自足的。当现实社会无任何声援、呼应时，革命会与青春同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城

邦”的新生活新经济新文化等等的出现，当代汉语思想界呈现疲乏之相，无力参与影响中国人的社会公共生活时，在四五一代和我这一代渐渐消歇之时，终有一些朋友打破沉默，面向社会发言，这既是青春的内在要求，也是革命的逻辑要求。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余杰、安替、吴冠军、卢周来、程亚文、谢有顺、黄钟、李猛、高超群、张健、于杰，等等正成为我们这个众声喧哗时代的语言之声，而年轻得让人生顾惜之心的林国荣、王怡们，正以知识思想的坚硬质地应对着我们社会的荒唐闹剧。这些并不全然能与读者见面的文字终于以文丛（虽然初步只有几位作者）的形式出版，或者能给有心人不小的启示。

我之看重这些文字，是因为这些文字多来自不曾受体制污染的目光，黄钟先生的文字真正属于“抽屉文字”，他的言路因诉诸常识的思路而为纸质媒体拒绝；谢有顺先生的文字有着域外的批评分析气质，他直面现象同情而有耐心；程亚文先生则在思考一个民族如何自处并与其他民族国家共处时有着难得的自由独立的心态；至于卢周来先生，其对社会公正的担当近年来已成为知识界重要的话题之一。我相信 70 年代学人对中国社会的介入有助于汉语知识为中国人早日寻找到那个“说法儿”。中国人生多罪与苦，中国人的精神需要安慰用嗷嗷待哺一说绝非虚词。有那么多江湖庸医大行其道，有那么多所谓繁荣的思想随笔的出现，我想，关于我们时代社会的真知灼见的必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想想看，我们在知识里活得像模像样，那么，年轻的朋友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又是如何看待我们的社会的？我们的社会接近了人的常识吗？我们的外交哲学平易健康吗？我们的经济生活公正吗？我们的文艺创作提升过我们的生活吗？这些大而具体的问题也是新人类们，本文丛的几位作者黄钟、程亚文、卢周来等先生思考的问题。

既然人生多苦罪，那么，庸医或各类中华将开太平的功法所

提供的，不过是“伪善”“傻美”（毛喻原先生语，他是四五一代人）一类的“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林国荣先生语，他是70年代生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批判精神的在场。所谓批判精神的在场，一定是体制内的权力自觉和权力实践。体制外，不过是历史或自然的辩证法则，即青春、思想的存在本身的要求。既然我们的知识体制已经失去合法性，已经弃置正当性，那么，批判精神只能由青春、思想来继承。知识体制或知识共同体，和中国“说法儿”，这双重的任务落到新一代学人身上，正说明我们民族的某种悲剧，即不仅我们知识体制内缺乏自我更新的机能，而且民族成员的各阶层、集团缺乏权力自觉和权力实践，社会的批判精神就仍只能落实到青春血肉之躯那里，落实到对知识还新鲜、自觉、尊重的知识人那里，落实到笃信知识乃是祛除人生苦难的思想写作者那里。



谢有顺 1972年生于福建长汀，1994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年起，发表有当代文学批评及思想随笔一百余万字，著有《我们内心的冲突》、《我们并不孤单》、《活在真实中》等。主编有“文学新人类”、“爱情档案”、“新媒体女性”等丛书。曾获“《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评论奖”、“《山花》理论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等。2001年2月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现居广州，供职于《南方都市报》。

前卫而不浮华，尖锐又不偏狭。如果说北方的评论家沉厚，注重于写什么，南方的评论家新颖，注重于怎么写，谢有顺却汇合了他们的长处，酝酿和发展着自己的气象。

——贾平凹





谢有顺 著

批评是一种能“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的写作

游手好闲地思想 黄 钟 著

我们每个人既是宽容的对象，也是宽容者

一个平民的政治主张 程亚文 著

人类及其文化的存在，在想像之境，浮现出它的价值与意义

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 卢周来 著

任何形式的歧视都是恶，任何与之背道而驰的努力都是善

封面繪圖 孟 煌

封面設計

外 陌 上 自 室

S A N M O

目 录

第一辑

作 家 们

余华：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	(3)
莫言：从檀香刑的梦中醒来	(34)
贾平凹：徘徊在虚实之间	(49)
尤凤伟：一九五七年的生与死	(58)
北村：写作能回家吗	(81)
徐小斌：一个女性的内心生活	(92)
刁斗：价值和想像的边界	(104)
于坚：看见比想像更困难	(117)
孙绍振：走向美学的途中	(124)
王彪：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	(136)
朱文颖：物质生活及其幻觉	(151)

第二辑

现 象 学

文学身体学	(165)
大历史散文内部的陷阱	(192)
这一代的爱情美学	(208)
十部作品，五个问题	(219)

走下神坛的“梦之队”	(228)
新媒体女性崛起的背后	(235)
女性写作新的难度	(242)
金庸小说的娱乐性及其衍生物	(248)
失眠的内心	(255)
五个词语，一条道路	(264)
后记：梦想一种批评	(287)